

資本主義、台灣社會與社會現象之建構： 總結與回應

謝國雄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首先，我要衷心感謝四位書評作者，願意細心閱讀《港都百工圖》，並且提出細緻、深刻與深具挑戰性的評論，這是對這本書最高的肯定以及對我最大的鼓勵。這四篇評論各具特色，許甘霖針對剩餘價值這個核心問題，提出一針見血的評論，藍佩嘉念茲在茲台灣資本主義的特色，鄭瑋寧緊緊追問台灣社會整體圖像、整體社會範疇，以及「想像與實在」，楊弘任則深究這本書的結構觀與另類的本體論。底下，我就依序回應這幾個十分具有挑戰性的評論。

一、剩餘價值

(一) 可能致命的質疑：是剩餘價值的占用或者僅僅是不對等交換

許甘霖提出了一個可能致命的質疑：港都勞動者在績效獎金的運作中，感受的是不對等交換，與剩餘價值的占用無涉，從而也就沒有所謂的「看穿剩餘價值的占用」。

這是十分立基(grounded)與細緻(fine-tuned)的挑戰。在苛扣績效獎金的例子中，工人明確表示看到勞動成果被占用。許甘霖的疑問在於，被占用的部分是否等於剩餘價值，或者只是一種不對等交換而已？

一方面，我欣然接受許甘霖提出來的詮釋；另一方面，我仍然堅持我的詮釋，並試圖將許甘霖的詮釋納入我的詮釋之中。這是大挑戰：如何將一個不承認剩餘價值的詮釋納入一個承認剩餘價值存在的詮釋之中？我分四個層次來說明，一是經驗現象（這是這兩種詮釋的共同基礎），二是比較歷史的觀點，三是方法論與認識論的立場，四

是說明「何以明明有剩餘價值，卻被經驗為沒有」。

就經驗現象而言，從書中的例子可以發現：績效變好的時候，績效獎金卻未必相應提高（有時升高後，又被公司壓低而抵銷）。如何詮釋這個苛扣獎金的現象？許甘霖認為這只是勞資之間的不對等交換，無涉剩餘價值，我則認為這涉及了剩餘價值的占用。這是勞資之間的不對等交換，無庸置疑。但「不對等交換」的內涵到底是什麼？最顯著的當然是勞資之間的倫理規範：訂下具有分享精神的績效獎金制度之後，勞資雙方就必須依據制度來運作，不然就是不對等。所以許甘霖的詮釋是對的：績效獎金的苛扣涉及了不對等的交換。

但許甘霖更強版本的詮釋（苛扣的績效獎金只是不對等交換，與剩餘價值無關）則值得商榷。「剩餘價值」指的是薪資工人在生產完與其工資相應的成果之後，還繼續生產出被雇主無償占用的成果。例如唐榮鐵工廠中生產獎金的分配方式讓現場勞動者感受到管理者分「吃」他們的勞動成果。相對於這種靜態的占用，美麗島工廠則重組勞動過程以提高生產績效，生產績效提高之後，獎金卻沒有隨之水漲船高，這是藉著強化對勞動力的運用來擴大剩餘價值，並進一步無償地占用。港都勞動者不僅感受到與資方之間的不對等交換，他們更質疑賺的錢怎麼被公司「吃」了、「一隻牛要剝幾層皮」，並感受到公司的錢是勞動者替它賺的。換言之，或許勞動者心中沒有Marx的「剩餘價值」概念，但上述勞動者的在地理解，卻足以支持「剩餘被占用了」。勞動者或許無法具體衡量績效變好時，應該增加多少獎金，但卻可以明顯感受到績效獎金被壓低、被減少、被「吃掉」的部分，「剩餘價值」在此呈現。因此，勞動者的在地理解不再只是對等或者不對等交換的面向，而是涉及了剩餘價值的被占用。

其次，比較歷史的觀點也可以協助我們釐清上述的爭議。在封建社會中，農民一年中有部分的時間耕作自己的土地，所得就是生計所需，有另一部分的時間用來耕作公田，所得就是上繳領主的剩餘，剩餘勞動在時間和空間上，與生計所需的勞動清楚分開。但在資本主義中，為生計所進行的勞動與為剩餘價值而做的勞動，因為「勞動者出

賣勞動力在工廠中工作」而無法在時間與空間上做出區辨。因此，在常識上任何人都無法分辨出生計勞動與剩餘勞動，但這並不意味著剩餘勞動不存在，而是因為剩餘勞動與生計勞動被混同、從而被隱晦了。在績效獎金的運作中，績效提高而獎金沒有隨之增加正好可以相對地透露出剩餘價值的存在與占用。

在方法論和認識論上，回到 Marx 的脈絡，可以發現剩餘價值已有許多轉型和變身（一般商品、利潤、再投資的資本、金融等），也有許多層次的掩蓋方式，不僅在商品交換層次進行掩蓋，在勞動過程中亦有許多掩蓋。¹ 因此，在多重變身與掩蓋後，剩餘價值已經無法被常識所意識。然而，常識無法意識到某個對象，未必代表它不存在。面對已被多層掩蓋的剩餘價值，研究者必須先假定它存在，然後去追問它如何被掩飾、如何可能被偵測到。社會學必須與常識保持距離，甚至與常識斷裂，這是嚴謹的社會建構論的方法立場。研究者必須從常識中建構出研究對象，透過重新建構，方能使不可見者變得可見。反之，倘若不去建構，研究者就會淪為現狀的共謀。

然而，剩餘價值明明就存在，為什麼港都的勞動者與許甘霖教授都認為它不存在？我認為，由於經驗對當事人如此真實，即便科學分析也不能去除經驗中的幻象性，也就是「存在的被經驗為不存在的」，如商品生產中的人與人的關係明明存在（這就是所謂的經驗中的幻象性），卻被經驗為物與物的關係（這對當事人再真實不過）。縱使 Marx 計算出剩餘價值，剩餘價值仍是常識上經驗不到的東西。許甘霖與港都的勞動者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並不令人意外，而是「意內」的當然。因此，許甘霖「不承認剩餘價值的詮釋」正是「承認剩餘價值存在的詮釋」的一部分。

（二）剩餘價值作為一種歷史範疇

許甘霖的另一個洞識是，「剩餘價值」是一個歷史範疇：

1 參見《港都百工圖》，頁4-6。

在台灣的商業資本主義、小商品生產、外包網絡中很難產生這個範疇，直到在美麗島工廠中，當工人體會到「自己做得越多，卻變得越廉價」的時候，或是當他們發現社會流動變得困難的時候，在此社會條件下，剩餘價值作為歷史範疇才會出現？

雖然 Marx 早已指出，當代經濟生活的各種範疇（「利潤」、「工資」、「資本」）都是資本主義下的特定範疇，從而就是歷史範疇，但許甘霖的洞識還是讓我有恍然大悟的感覺。民營與公營大企業中，「剩餘價值」可以辨識，但在行業傳統中，剩餘價值不容易辨識，例如對行業傳統中的自營作業者而言，剩餘價值並不存在，但對於雇用師傅的小頭家而言，剩餘價值則開始浮現。如果說民營與公營大企業是剩餘價值的當代史，那麼行業傳統說不定呈現了剩餘價值的「史前史」。若能細緻處理，這將會是反省 Marx 學說的重要契機。

二、台灣資本主義

（一）台灣資本主義的特徵

藍佩嘉藉著質疑本書個案的選擇提出另一個關鍵的問題：台灣資本主義的特殊性何在？

這是《港都百工圖》試圖回答的重要問題。

先說明個案選擇。統計學上的抽樣，通常是知道了整個母體的一般性的特徵（如年齡、性別與職業的組成），然後再依據試圖檢驗的假說來抽樣。但在《港都百工圖》中，我們並不知道高雄市行業的整體特徵，這個整體特徵有待勾繪，從而不足以作為抽樣的依據。我能做的，比較接近拼圖：一塊一塊地增加、連結，試圖拼湊出整體的圖像。

但這個漸進式積累的過程，並非漫無方向，而是在「勞資範疇的分化」這個主軸下進行。勞資範疇的生成變化史，可以讓我們辨識出台灣資本主義多樣的發展途徑，深化我們對商品拜物教的理理解，從而

勾繪出台灣資本主義的特殊性。

如書中指出：行業傳統呈現了不同類型的勞資範疇生成變化史（頁 140-142）。皮鞋業的行會傳統轉變為產業的典型勞雇關係，這符合西方模型。鐵路貨物搬運業的勞資關係的基調是邁向西方模式，即朝典型的勞資關係發展，當中卻有逆轉西方模型的小插曲：倒用資本拜物教和勞僱用資。計程車業的勞資關係發展，逆轉了西方模型：由典型的雇傭關係，朝自營作業與合作社的方向發展，中間出現過「資不資，勞不勞」的擬「倩」收租關係。派報業是未曾「西方」化的模型：自始即是承攬關係，雖有轉變為雇傭關係的契機，但因為勞動法令的內部矛盾而未能兌現，最終以「公司」與公司間的關係作結。勞動者由人與人間的結合，變成資金間的結合。派報職業工會則提出另類的理想，即集體的雇主與集體的受僱者，共同籌集社會保險基金來照顧勞工。辯士業則一直維持行業傳統（師傅由頭家倩）直到該行業式微。小結來說，皮鞋業與鐵路貨物搬運業中勞資範疇的發展，符合西方的模型，但派報業與電影辯士業則從未西方過，而計程車業甚至逆轉了西方模型。兩點訊息十分清晰：

其一、勞資範疇是會變化的，當今資本主義呈現的二分與固定可能是特定時期的現象；其二、進入西方模型的勞資範疇並非必然的，當中有未曾西方化甚或逆轉西方化的個案。（頁 142）

這對於商品拜物教念茲在茲的「剩餘價值之掩蓋」又有何意涵？在這幾個行業中，勞資範疇是由國家打造出來的，剩餘價值的萃取相當透明。但另一方面，這些行業的勞動過程卻又有掩飾剩餘價值的萃取之效應。同時看穿與擁抱剩餘價值可能是台灣資本主義的一個特徵。

其實，藍佩嘉也替我回答了上述這些問題。國家、外資與文化框架在台灣資本主義發展史中扮演關鍵的角色，因而讓台灣資本主義呈

現其特殊性。我系統地處理了國家與文化，但並未深入處理外資的影響，希望將來勾繪台灣資本主義發展史時，能正面處理這個重要的議題。

（二）台灣商品拜物教的特殊性與多樣性

台灣資本主義的特殊性也可以從商品拜物教的展現來考察。許甘霖點出了商品拜物教在台灣社會中多樣與特殊的展現，也就是資本拜物教與技術拜物教。

這個觀察支持了本書的論點。首先，資本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的進一步展現，鐵路搬運工會理事不僅信奉資本拜物教，甚至運用資本拜物教來對抗主張鐵路搬運市場應該開放的論點。其次，美麗島工人對抗績效獎金遞減時，也顯示出「勞動」（包含了技術）有其應得的勞動成果，這透露出看穿商品拜物教的訊息。要留意的是，這與資本拜物教相互矛盾，本書即試圖化解這個矛盾。簡單地說，港都勞動者同時擁抱與看穿商品拜物教，但最終的訴求是讓商品拜物教中的等價交換真正體現，這可能是台灣商品拜物教的特色所在，而這又與雇主的霸權經營、薪資制度、「全括的商品霸權」及平權的人觀有關。²

（三）商品拜物教與台灣民間信仰

此外，台灣資本主義的特殊性可以從民間信仰來考察，許甘霖指出了 Michael Taussig 有關南美魔鬼信仰與資本主義發展的研究成果。

關於宗教信仰如何影響資本主義運作的問題，台灣宗教的運作和展現方式不同於南美洲，我在書中提到勞動者的「命」、「運」觀念，是台灣社會的在地理理解範疇。台灣工人援引「命」、「運」觀念，但不導向悲觀主義的臣服，反而能夠通過這些觀念來反省批判現狀。這與南美的薪資勞動者運用魔鬼信仰來批判資本主義類似，但是台灣的信仰體系不同於南美，因此援引與運用的在地理理解範疇也就不同。

2 參見《港都百工圖》，頁 421-427。

三、台灣社會整體圖像

鄭瑋寧提出了一個大哉問：《港都百工圖》中是否呈現了台灣社會的整體圖像？「若說《茶鄉》將整體社會範疇、社會邏輯和社會圖像等三者緊密扣連並提出社會整體圖像，那麼《港都》一書強調在地理範疇與存在感，對於重新理解被研究社會的整體圖像，究竟帶出怎樣的新空間？」

這個問題將我逼到一個無可迴避、但是十分關鍵的課題。如果勾繪社會整體圖像是社會學家的使命，那麼《港都百工圖》勾繪出什麼樣的整體圖像？這個整體圖像比《茶鄉社會誌》勾繪出來的整體圖像更勝一籌嗎？更具體地說，鄭瑋寧指出：如果「全括的商品邏輯」、「行動與結構的辯證與互構」（如結構力量的呈現樣態、行動的中介效應和「大迴路」），以及「存在感」是《港都百工圖》的重要成就，那麼依此而來勾繪的台灣社會整體圖像是一個什麼樣的面貌？

讓我回顧一下我的四部曲。“Boss” Island 與《純勞動》將台灣看成是資本主義社會，《茶鄉社會誌》則指出報導人的社會圖像是「親屬、經濟、政治」與「宗教」分立，並且由對等交換與務實原則串起這兩個板塊。《港都百工圖》呢？一是指出社會性原則中的「全括的商品霸權」，二是指出社會生活的另一層實在，即「存在感」，三是證明了社會實在的辯證發展（大迴路）。「全括的商品霸權」深化了《茶鄉社會誌》中的務實與對等交換的社會性原則，從而更具體地呈現台灣社會整體圖像，但「存在感」和「結構與行動大迴路」都相當抽象，以致於無法準確指出台灣社會圖像的特殊之處。換言之，《港都百工圖》長於重新概念化「社會」，而短於準確呈現台灣社會整體圖像，但前者是讓後者有突破的契機。

更具突破潛力的是鄭瑋寧的提議，如果以隱含在書中的各種「社會想像」（解嚴的民主化社會 vs. 戒嚴般的工廠，平起平坐的關係 vs. 科層僵化的關係，強調工廠同仁間彼此互助、互諒的倫理關係 vs. 異化疏離的工作關係等）來勾繪台灣社會整體圖像，那又會是什麼樣的面貌？真是大哉問！在此，讀者比作者更細緻、更有想像力，我欣然接

受這個建議，並希望落實在未來的研究之中。

四、延續與創新？整體社會範疇與在地理理解範疇

再一次，鄭瑋寧提出了有關在地理理解範疇的大哉問。《茶鄉社會誌》一書勾繪出在地理理解範疇的深度與複雜性，相對的，《港都百工圖》則限縮了在地理理解範疇的討論。其一，因為在地理理解範疇在《茶鄉社會誌》中除了自成一格、不可化約之外，更展現了可塑性，如「報」、「頭家」、「份」的延續、超越、新增、矛盾等，但在《港都百工圖》中，只看到理解範疇的自成一格與不可化約，已看不見其可塑性。其二，在地理理解範疇在《茶鄉社會誌》中體現了社會性原則（對等交換與務實）而成為整體社會範疇，而在《港都百工圖》中則只是在地理理解範疇而已，未涉及社會性原則。換言之，就理解範疇而言，《港都百工圖》有延續，但沒有創新，甚至限縮了。

首先，在可塑性的討論上，鄭瑋寧以「家」為例，說明了「家」的意義隨著資本主義的進展而變化。相反的，《港都百工圖》將「家」視為當然，聚焦在家對於資本主義運作與存在感形成的影響，甚少反過來探討：資本主義對家又帶來了哪些影響？如果資本主義的進展是讓成家不再可能時，家還會發揮類似的作用嗎？非常精采的評論，我欣然接受，並且將這訂為未來研究的重點課題。

但在其他範疇上，在地理理解範疇與政治經濟學範疇間的連屬，一直是我的焦點。《茶鄉社會誌》指出：村民透過在地理理解範疇來理解工資，《純勞動》則呈現了多樣的連屬形式，如理解範疇（命、運等）不僅與「工資」或「職災」等相生，同時也會相剋（對生產關係的理解瓦解了命與運的詮釋）。《港都百工圖》則指出：勞動者可以活用原本是命定的「命」與「運」等範疇重新詮釋與資方的鬥爭。

小結來講，我的可塑性，指的是在地範疇如何被行動者活用，而鄭瑋寧的可塑性，指的是在地範疇的變遷，而這確實是未來探究在地範疇時必須面對的課題。

鄭瑋寧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整體社會範疇與在地理理解範疇的關

係。首先釐清一點，她認為《港都百工圖》的處理焦點已經由整體社會範疇移轉到在地理解範疇。其實不然，不論《茶鄉社會誌》或者《港都百工圖》處理的都是在地理理解範疇（如「倩」、「頭家」、「份」、「報」、「做」、「命」、「運」等），一旦發現可以體現社會性原則的在地理解範疇，就可以稱之為「整體社會範疇」。在《茶鄉社會誌》中，「份」與「報」就是兩個例子。在《港都百工圖》中，「份」與「報」雖然並未明顯出現，但其體現的對等交換原則可以在美麗島工人的「互相」中看出蛛絲馬跡。

但問題仍在：為什麼《港都百工圖》不持續探究像「份」與「報」等整體社會範疇，精益求精？學術研究最佳的狀況是結合了延續與創新，但因為所有的研究都是各種因緣具足的產品，從而甚難完美地完成這個理想。每次研究的田野、遭遇到的報導人、研究者與報導人的互動，都隨著各種因緣組合而不同，從而創造出來的資料、呈現的現象、分析的課題、詮釋的重點，以及理論的企圖，自有不同。但這不能成為逃避的藉口：如果《茶鄉社會誌》證明整體社會範疇如此重要，那麼《港都百工圖》就應該持續探究下去，不能因為研究的人、時、事、地、物、各種遭遇不同而移轉重點。

或許我可以稍稍辯解。鄭瑋寧評論的重點是《港都百工圖》的在地理解範疇並未涉及整體社會範疇中的社會性原則的體現。其實，在探討商品拜物教的實踐與逆轉時，就已經觸及了對等交換這個社會性原則。商品拜物教涉及的是流通領域中商品的等價交換、生產領域中雇主對剩餘價值的無償占有，以及這兩者的關係。港都勞動者看穿了生產領域中雇主對剩餘價值的不等價占用，並要求將流通領域中的等價交換落實到生產領域中。進一步，港都勞動者是將等價交換安置在「互相」的對等交換邏輯之中。從這個角度來看，《港都百工圖》還是在處理台灣社會中的一個社會性原則，即對等交換，不過這一次是細緻地與資本主義的核心生產秘密結合在一起討論。猶有進者，《港都百工圖》指出了具有普遍效力的「全括的商品霸權」來具體化對等交換這個社會性原則。

這就涉及了研究的前景化 (foregrounding)。除了理解台灣的資本主義之外，《港都百工圖》試圖達成的目標是什麼？一是確立社會生活中另一個層次的實在，即「存在感」所指涉者，二是藉此與舊的基本議題（結構力量／行動）搏鬥，三是從而確立新的基本議題。這幾個目標與《茶鄉社會誌》以在地理解範疇來勾繪台灣社會整體圖像不同。即便如此，《港都百工圖》確實有延續與創新，例如，在《茶鄉社會誌》中，「做」是一個存有範疇，與「命」相關（「做」是人的宿命）；在《港都百工圖》中，「做」是存在感的一環，但存在感還有其他的面向：為何、為誰而「做」？在這個意義上，《港都百工圖》既延續又創新。

鄭瑋寧的提醒十分重要，設想如果沿著整體社會範疇的方向發展下去，《港都百工圖》將會是一個什麼樣的面貌？「做」、「份」、「報」等整體社會範疇如何展現在港都的勞動生活之中？與他們對資本主義的經驗有何關聯？是的，研究者應該一以貫之，貫徹始終。

藉此回應藍佩嘉提到的「文化」，誠如她所指出的，第六章的「合理化」經營哲學與第七章中的美麗島工作現場的「打到文化」都是企業組織文化的一環，她期許我更全面地處理這個議題，我誠心接受。至於不同層次的「文化」如何在工作現場交織，從而帶來順服或者看穿的效應，正是《港都百工圖》的核心議題之一，如唐榮工人的幽默感展現了台灣通俗文化與工作現場文化的結合（頁 234-235）、美麗島工廠的「打到文化」與合理化企業文化的連屬（頁 373-377）、現場的「團體活動」（頁 391-394）等。

五、結構觀、另類的本體論與幻象／實在

楊弘任針對《港都百工圖》的結構觀與另類本體論，提出了犀利的批判。首先，他指出《港都百工圖》雖然讚賞 Sewell 更聚合、更簡潔的結構觀，但所發展出來的結構觀太同質卻又太發散，因為它仍然在追問種種志願性順服的總體驅動機制何在，同時又提出無處不在的各種結構樣態。其次，《港都百工圖》仍然呈現了二元化的結構觀：

限制的「資本主義這個結構力量」與解放的「展現在工作與家的存在感」之二分。最後，他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建議：

是不是在「結構，非結構，是名結構；行動，非行動，是名行動」之後，也能輕輕鬆鬆說下去「存在，非存在，是名存在」，以嚴謹的在地細節與在地範疇為基礎，貫徹出一種更徹底的另類本體論、認識論、基本議題與研究技法呢？

首先，《港都百工圖》的結構觀確實是以 Sewell 為對象，但卻另闢蹊徑。Sewell 最大的貢獻是藉著重新概念化「結構」來解決人的能動與結構的變遷的問題。他標示出結構的一般性質：圖式(schemas)與資源的結合，一般化、不可化約、具有不同的深度（如結構滲透的程度、不被意識到及被視為當然的程度等）、「多樣的、權變的、裂解的」。我則認為這些「總稱性質」，其實就是所謂的「結構力量的呈現樣態」，例如，深度不是結構的總稱性質，而是結構力量的呈現樣態（變身或者隱身），「多樣的、權變的、裂解的」亦然。我並進一步指出結構力量的呈現樣態有其獨特的效應，是結構力量的一環。在結構力量的變遷上，我則發展出包括了結構力量的呈現樣態與作為中介的行動的「大迴路」，指出行動與結構力量的對稱互構和不對稱互構，藉此準確地描述結構力量的動態發展。³如果 Sewell 的架構是「聚合、簡潔、清爽」，那麼將其含括進來的「結構力量的呈現樣態」與「大迴路」等，也應該同樣「聚合、簡潔、清爽」。

由此，導向有關同質化與發散的討論。楊弘任的「同質化」意味著我將所有的動力都歸諸於資本主義，其實不然。《港都百工圖》中的勞動者除了為打拼工作之外，也為了家庭。他的「發散」，指的是結構力量的各種呈現樣態（現身、變身與隱身），但實際上這卻是對於「多樣的、權變的、裂解的」結構力量最簡潔的勾繪，並不「發

3 參見《港都百工圖》，頁 16-20、456-459。

散」。

其次，有關二元觀評論。楊弘任指的是「結構力量」與「存在感」的二分，但我指出：

從經驗面來看，求職與失業是勞動力市場上的活動，勞資關係、薪資制度與現場生活構成了勞動體制。勞動力市場是勞動體制的前提與結果，工會運動試圖改變勞動體制，存在感則是薪資勞動整體經驗的體現與再現。換個方式來說，存在感立基在勞動經驗，但卻又與其有別，具有不可化約的效應，是獨具一格的實在(reality sui generis)。在分析層次上，存在感與結構力量同源、異質、具有影響結構力量的效應。
(頁 466)

這樣的論點應該與二元觀大大有別。

最後，有關另類本體論的大膽提議。在這裡，楊弘任點出了《港都百工圖》透過細緻民族誌對「結構力量與行動」的重新概念化以及揭櫫「存在感」的潛力，那就是發展出另類本體論、認識論、基本議題與研究技法。引入呈現樣態後，讓「結構，非結構，是名結構」、「行動，非行動，是名行動」，或者更具體的「勞動者，非勞動者，是名勞動者」變得可以理解。這樣的躍進，同時涉及了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與存在論。即便如此，要由這裡走向更深沈與更普遍的「存在，非存在，是名存在」，需要有更全面、更紮實的研究來佐證。可以確定的是，在「結構力量與行動」這個基本議題上，《港都百工圖》確實是以另類的認識論與存在論來重新概念，從而不同於 Sewell 的作法。

在另類本體論上，鄭瑋寧針對《港都百工圖》的具體例子，提出了兩個十分聚焦的問題。一是港都勞動者如何看待想像與實在的關係？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是否真會清楚區辨想像與實在之別？二是他們如何透過「非實在」的形式來理解與建構實在？

上述的提問有兩個用意，一是提醒作者要留意港都勞動者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看得到對「非實在」的經驗，二是港都勞動者會以「非實在」來體現、再現社會生活的實踐。這個提問的意涵，鄭瑋寧說得非常好：

勞工的務實關懷之實現，並非將影響人的互動與社會生活的力量囿限於此時、此刻或此世，在平時隱而未顯的宇宙觀秩序與運作邏輯，與此時此世的實作一同運作，才使社會生活得以可能。

我完全同意，而且十分佩服鄭瑋寧針對書中的民族誌材料提出如此細緻的詮釋，並且指出這些詮釋的意涵。

我想沿著這樣的方向，往前推進一步。如果報導人的社會生活中，就是「實在」與「非實在」緊密交織，那研究者要如何探究這樣的現象，並且以適切的方式來再現？在這個意義下，本書所採取小說這個再現形式，雖說是虛構、非實在，但反而更貼近報導人的社會生活，不是嗎？

六、未竟之業

任何一本書都有未竟之業，《港都百工圖》也不例外。藍佩嘉指出了「女工的缺席」以及「男工的性別實踐」（他們不只是在「做工人」，也在「做男人」）。我完全同意，也謝謝她從這本書的田野資料中敏銳地點出做性別的意涵，從而讓我有機會檢視性別與勞動的細緻連結。

《港都百工圖》的未竟之業不止於此。如何勾繪台灣資本主義發展史？更具體地說，“Boss” Island，《純勞動》、《茶鄉社會誌》、《港都百工圖》等所累積的微觀的知識，如何有助於勾繪長時段和宏觀的台灣資本主義發展史？資本主義在台灣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是否出現過有別於資本主義的另類想像與實踐？資本主義和台灣社會相互建

構的歷史過程為何？在基本議題上，如何以存在感為核心，發展出有系統的研究課題？由此而來的一個更大的企圖則是：如何在另類本體論上開啓嶄新的社會學研究？

資本主義的核心運作機制、台灣資本主義的特徵、台灣社會的整體圖像、社會現象之社會學建構與再現等，都是四位評論者針對《港都百工圖》提出的關鍵議題，期待未來的研究能在這四個議題與未竟之業有重大突破。